

# 破解执行难:着力于机制的程序化透明化

在造成执行难的众多因素中,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特殊主体阻碍或抗拒执行、一些被执行人利用权力或经济优势故意规避执行是最突出的

题到相关部门上访的人员一直不绝,与执行有关的极端事件时有发生。

“法律白条”并非法律术语,是执行难的现实将它演变成一个热门词语。一些人手中的“法律白条”难以兑现,以至有些人宁可委托“讨债公司”去讨账或拍卖判决书,而不通过法院诉讼来追讨债务。执行难成为社会各界质疑法院工作的问题之一,近年两会也屡屡有代表委员提出要求法院尽快破解执行难的议案、提案,但仍有相当多的案件长期得不到执行。

为破解执行难,最高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做了许多努力,如执行会战、限期集中清理

等,虽然办结了不少积案,但执行难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在造成执行难的众多因素中,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特殊主体阻碍或抗拒执行、一些被执行人利用权力或经济优势故意规避执行是最突出的。

针对上述现象,2008年最高法院提出了建立执行联动机制、执行威慑机制等一系列对策。这些机制在一些地方取得了一定成果,如河南省通过启动执行联动等机制,执结积案近11万件,占积案总数的80%多,有些地方甚至限期执结了90%的积案。

机制中的各单位职责不明、不细,没有操作细则,没有程序规则,没有责任落实,责任追究不明确等。

针对执行联动机制发挥作用不明显的现状,最高法院近期发布的《意见》提出了一些具体解决措施,如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解决执行难问题,在制度上明确相关党政管理部门在执行工作中的具体职责等。这些措施突出强化执行机制的执行力,强调进一步落实责任追究制度,细化联动程序,明确联动责任,公布不执行联动机制有关单位等。

我们期待通过强化执行联动机制、建立执行威慑机制、强化执行监督制约机制等一系列机制制度建设,使相关执行机制更加程序化、透明化、制度化,使执行难问题尽早化解,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 铁路公检法改革:利益格局的调整

□杨涛

据7月28日《成都商报》报道,日前,国家公务员局、铁道部在京联合召开会议,对铁路公安民警公务员过渡工作进行全面部署。此次转制的不仅是铁路公安,铁路检察院、铁路法院都列入其中。这一新闻被舆论称为“铁路公检法改制划归地方”。

铁路是企业,公检法是国家机关,享有行政权、司法权,由企业领导公检法不符合法治原则;铁路公检法涉及的案件都与铁路部门有关,由铁路部门领导公检法,难保司法独立和公正。正因此,公检法从铁路部门剥离,已成共识。然而,这一改革和剥离多年来一直步履蹒跚。

首先,这一改革并不是简单的转变理念,而是涉及复杂的利益格局调整。铁路公检法运转的几十年间,积聚了深厚的既得利益,站在铁路部门的立场,从前领导公检法,可以在涉及自身利益的案件中占尽便利,现在要将这块权力交出,自然难以割舍;而对铁路公检法工作人员而言,也存在利益变局,铁路的收入与地方的收入不同,有的高于地方,有的低于地方。如果收入降低,谁会愿意转制?

此外,铁路公检法改制划归地方后,仍需要独立的铁路公检法系统,还是将人员直接分流到地方公检法?分离到地方后,其人员经费的开支由谁负担,地方还是中央?如果不能有效地调整各方利益格局,改革能否顺利进行还是未可知。

改革自然要打破不合理的既得利益,要对合理的既得利益和新的利益关系进行分配和平衡,要建立一个利益博弈的平台。

## 圈点新闻

### 高墙外的改造

据《京华时报》报道,日前,河南周口监狱组织10名表现良好的服刑人员参观了南街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走进村民家做客。监狱称,这是对犯人教育改造方式的创新。

一些人认为,犯人只有被关进监狱,被限制自由才能被最好地改造。依我看,犯人也是人,外出参观是对他们的一种信任,同时促使他们更加珍惜今后的生活。这些高墙外的感化教育或许力量更大。

### 警车也套牌?

据《京华时报》报道,近日,甘肃省环县公安局院内6辆警车共用3个警用车牌并且扎堆停放事件被曝光。庆阳市公安局称,已对违规警车牌予以没收。

对套牌车,人们并不稀奇,而套牌警车,并且是警察自己套的,确是新闻。“扎堆停放”,这种“秃子头上长虱子”的行为,难道有关部门看不见?开着套牌车的警察如何还能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人守法?

### 这也叫“停职”?

据《广州日报》报道,陕西横山县一批已被省政府明令要求关闭的煤矿仍然非法开采。事情曝光后,该县参股其中的7名干部被停职。然而参股300万元的矿管办副主任被停职后,依然正常上班。

停职不停工,这样的停职还有什么意义?这样的问责目的何在?犯了错,官照做、钱照拿,如此“被停职”、“被免职”,兴许不过是为了堵住民口。如此问责比不问责更可怕。

## 新闻观察

### “一日成林”的背后是公众评价缺位

住建部日前通报了国家园林城市复查情况,严肃批评部分城市的急功近利。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司长陆庆华介绍,有些城市将园林绿化当做“政绩”和“形象”工程,违背植物的生长规律,盲目从荒山郊野或深山老林移植大树、古树进城,有的地方一平方米种上几十棵树,追求“一日成林”,甚至假树假花假草上街头。(见7月29日《新京报》)

这种现象在此前的新闻报道中并不鲜见,在一些城市光鲜的园林绿化建设的背后,是城市周边地区原生态的严重破坏,甚至是城市越诗意、周边越荒凉,对城市周边的原生态形成了“空吸”效应。更有甚者,假树假花假草上街头,完全演变成了人、财、物的形式主义浪费。此种现象屡治不绝,应该说住建部找到了问题的“七寸”,即有些城市将园林绿化当做“政绩”和“形象”工程。

但问题在于,在住建部颁发的《国家园林城市中申报与评审办法》和《国家园林城市标准》中,并没有对遏制城市园林绿化的“政绩”和“形象”工程倾向做出制度预设。众所周知,不能受到充分有效群众监督的公权力,基本上是对上不对下的,是对权力考评者负责,对权力任免者负责,而不是对权力服务对象负责。

笔者翻遍了《国家园林城市中申报与评审办法》和《国家园林城市标准》,没有找到任何

的民意评判空间。在这套评判体系中,城市及政府有关部门只需要对住建部以及住建部组织的实地考察专家组、评审委员会负责,没有对本地城市居民调查问卷或者走访问询的制度设计。那么,在这个封闭的体系中,中报者就有了自圆其说或者临时抱佛脚的空间,出现“一日成林”的荒诞怪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长期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居民,对城市是否能够称得上“园林城市”,是最有切身体会和发言权的。而且,城市规划的不断调整和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让评上“园林城市”就基本上不可能被摘帽的城市管理者,有了不少改变评审时城市园林绿化面貌的可能,让静态的荣誉笼罩在动态的空

间之上,往往就要出现名不符实的尴尬。

公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不要说“违背植物的生长规律”,就是违背居民生活规律的现象也是不少的。当然,我们可以对造假的公权力批判和质疑,但是最为行之有效的途径,莫若在制度设计中预设制约权力的空间。

其实,“园林城市”并不仅仅是“政绩”和“形象”问题,根本上是城市民生问题。所以,“一日成林”现象所暴露出来的,实质上是民生改善的问题。当某些以“建设”名义的行政行为,最终落到民生福祉上时,我们就应该深思如何打破民生领域的权力不受公众监督的问题。否则,住建部所提出的“保障市民出门300至500米能见绿地”的愿景,也有可能被假树假花假草所填充。

## 图说

### 一夫当关



据《新快报》报道,从7月13日起,广东东莞大朗模具厂便将男厕锁住,每天按照规定时间开放,并且仅有几分钟。员工如想在规定时间外如厕,必须找经理批条子。为了防止员工利用如厕的机会偷懒,不少企业都采用类似办法。这种压抑人的基本需求的做法,真能使工人安心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吗?只怕适得其反。

## 大众话题

### 谁给了“地王”晒太阳的自由

广州近日爆出该市2007年批出的27块区域“地王”,竟有24块尚未开工或者未售。(见本报今日四版)

公众有理由怀疑,2009年诞生的天价“地王”,有可能重走2007年地王晒太阳之路。因而,如何解决“地王”摆荒问题在当前是对政府的严峻考验。

“地王”晒太阳,一方面因为不能及时有效利用而对土地资源造成极大浪费,另一方面又造成土地供应紧张,助长了地价泡沫和房价泡沫。

“地王”何以晒太阳?有的是市场原因,比

如说“地王”的周边楼盘价格低,现在开发销售开发商会赔本;有的是因为开发商的原因,比如说资金链紧张无力继续建房;有的则是因为规划等方面的原因开工不了。更重要的是,某些开发商拿“地王”的本意不是开发房子,而是要把土地当成资本运作的工具。

早在1994年,已有《闲置土地处置办法》。近几年,国务院出台的“国X条”,几乎都有处置闲置土地的相关要求。这些制度是打击囤地的有力武器。但这些制度执行得不尽如人意。

比如,制度规定,连续两年未使用的闲置土地可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可究竟什么样的土地算使用?盖几个“工棚”算不算开发?挖个地坑放着算不算使用?制度规定“每宗地开发建设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3年”,但“原则上”三

个字就给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留下了操作空间。

对于“地王”晒太阳,广州市国土房管局有关负责人称,“没收土地出让金,收回土地出让权,并且进行罚款。”但问题是,开发商连定金往往都没有交够,更别说交足额的土地出让金了,土地出让金都没有交齐,如何没收土地出让金?再说罚款,处罚结果与开发商囤地获利相差悬殊,罚款能有多少震慑力?

显而易见,“地王”晒太阳,主要原因是土地监管制度的不健全,土地执法的软弱。整治“地王”摆荒,首先是完善土地监管制度,不给开发商可钻的漏洞;如果发现某个开发商囤地,理应收取消其以后参与土地竞拍资格。其次是严格执法,不让制度打折扣。只有违法成本大于受益时,开发商才会拿地谨慎。

# “舞台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好”

人物检索:杨建军,男,生于1953年。1969年初中毕业分配到沈阳鼓风机厂当铆工,现为沈阳鼓风机(集团)公司高级工人技师。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2008年1月,他创造并实施的“离心压缩机、鼓风机机壳拼装制造技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被称作“中国焊接机壳拼装制造第一人”。

2008年1月8日,我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企业奖励我一辆“中华牌”轿车,一名只有初中文凭的普通工人能登上国家科技殿堂,能每天开着私家车上班,这是我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过的事儿。

刚进厂时,我主要从事安装风机机壳的活儿,产品多数销往国内。改革开放,我所在的企业发展非常快,成为为国家石油、化工、冶

金等重点行业配套离心压缩机和鼓风机的骨干企业。设备、技术越来越先进,市场越来越大,对我来说,施展技术才能的舞台也越来越大。

因为改革开放,我们开始与外国同行打交道,知道有的发达国家用的是非常先进的“柳焊拼装机壳”,1992年时,我厂决定将压缩机机壳由铸造改为焊接拼装。我主动请缨担

## 环保部加强进京车辆环保标志管理

本报讯(记者王冬梅)记者7月28日从环境保护部获悉,为加强机动车排放管理,做好华北区域空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环境保护部日前分别印发《关于转发<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发布本市第十五阶段控制大气污染措施的通告>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进京机动车环保合格标志管理的通知》,要求对机动车实施环保合格标志管理。

《通知》要求,对经环保定期检验合格的车辆,符合国I(含)水平以上的汽油车、国III(含)水平以上的柴油车,发放绿色环保合格标志,其余车辆,核发黄色合格环保标志。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拖拉机和摩托车不在标志发放范围内。2009年6月1日起,进京机动车车主可在机动车注册登记地级以上城市申领机动车排放合格证和环保合格标志。2009年9月1日起,北京市将对违规进入的外埠车辆进行执法检查,无环保标志的车辆不得进京。持黄色环保合格标志的进京机动车,在2009年10月1日以前,全天禁止在五环路以外(含五环路)行驶;2009年10月1日以后,将全天禁止在六环路以内(含六环路)行驶。

## 王挺军:炽热忠诚暖社区

本报通讯员 翟耀 管建敏  
本报记者 杨连元

7月24日这天,在河南省军转干部座谈会上,全国模范军转干部、新乡市红旗区洪门办事处新兴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王挺军介绍了自己自主择业、扎根社区8年的不凡经历,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掌声。

王挺军曾经是一位副团职军官,他把自己的一片忠诚炽热投入社区工作当中,尽心竭力为居民们排忧解难;他工作过的两个社区也先后获得“全国文化体育先进小区”、“全国计划生育协会先进单位”、“河南省文明和谐小区”等20多项殊荣。

那还是2001年,已在甘肃艰苦地区服役23年,并在副团职岗位上工作5年的王挺军,被确定转业了。当时,正值军队提倡转业干部

自主择业,王挺军毅然选择自主择业。2001年5月份,新乡市红旗区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居委会干部,王挺军报名应聘了,最终,他以明显的优势被推荐为春夏社区居委会主任候选人。7月份,这个朴实憨厚的转业军人当上了春夏社区居委会主任。

春夏社区是一个老居民区,居民的用水管道与污水处理条件都老化了。上任之始,王挺军从转业费中拿出两万多元,又在区政府、办事处支持下,筹集资金10多万元,改造水源设施。

一年之后,这个社区有了3000多平方米的水泥路面,楼间空地,建成280平方米的标准社区服务楼,设置社区党支部、社区办公室、社区警务室等“一站式服务台”,设立了居民学校、室内健身房、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等,成为新乡市乃至河南省第一批花园式

## 我和我的祖国

任了攻关任务。我带领几名工友连续攻克了“中分法兰反变形”、“进出口风管压型”、“筒体两端板曲率”等5道难关。3个月后,鼓风机厂第一台柳焊拼装的压缩机壳诞生了!此后,第一台国产化36万吨乙烯裂解气压缩机,第一台国产化10万吨甲醇压缩机,第一台国产化M480抽流压缩机,第一套国产化4万空分空压机组,第一套国产化800万吨炼油装置用机组相继诞生。(本报记者顾成整理)

现代化社区。王挺军常说的一句话:“社区连着社会,社区安、社会稳。”那是2005年,另一个社区——新兴社区的状况牵动了王挺军。这个社区地处城乡结合部,上千人失业,不少人连续上访,必须想法设法做好稳定工作。王挺军主动请缨,来到这个社区工作。

王挺军到任之后,为解决居民中下岗职工的问题,他一个个与党员、失业居民谈心交流,征求他们的意见,还把180名党员组织起来,成立5个党支部、16个党小组,深入开展“为政府分忧,为党旗增辉”活动;党员们分片包干,结对帮带,共同做好失业人员的工作。

围绕着居民再就业问题,王挺军在辖区内与5家企业往来奔走110多趟,反复协商,最终安排1000多名工人,让他们“日常工作有,生活有保障”。

以及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范围内,群众反映强烈、环境问题突出的村庄。

这位负责人介绍说,10亿元专项资金中,约9.2亿元用以支持1200多个环境问题突出的村庄开展环境综合整治。其中,近70%的村庄位于水污染防治重点流域、区域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范围内;约0.8亿元用以支持170多个全国环境优美乡镇、国家级生态村开展生态示范建设,将有超过900万群众直接受益,带动各地农村环保投资近15亿元。

## 聂耳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聂耳,原名聂守信,祖籍云南玉溪,1912年2月出生于云南昆明一个贫苦的中医家庭。1927年考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刻苦学习小提琴,积极参加文艺演出,并开始阅读进步书刊。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此后经常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活动。1930年7月,因躲避反动当局的追捕来到上海,不久参加反帝大同盟,并积极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活动。

1931年4月,聂耳考入明月歌剧社,正式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风起云涌,此时,聂耳结识了共产党员、戏剧家田汉。在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下,思想觉悟不断提高。1932年赴北平参加革命音乐活动,不久回到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1933年初,聂耳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聂耳不仅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艺术才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成为中国新音乐的开路先锋和反法西斯的勇士。在此后的两年中,聂耳为歌剧、话剧和电影谱写了《新女性》《开路先锋》《大路歌》《前进歌》《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等主题歌和插曲30多首,在全国广为传唱,对激发动员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作用。他所编

写的《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山国情侣》等乐曲,深受人们喜爱。1935年1月,上海电通影业公司拍摄抗日影片《风云儿女》,田汉为影片写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聂耳承担了为之谱曲的任务。他于3月中旬开始创作,几经修改,4月下旬将定稿交给电通公司。5月8日,上海《申报》《时事》刊出《义勇军进行曲》词谱;9日,百代公司为《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唱片;24日,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风云儿女》。随着唱片和电影的宣传,上海各个角落都响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声。这首歌以其高昂激越、铿锵有力的旋律,鼓舞人心的歌词,反映了在民族危亡时,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御侮、奋勇抗争、一往无前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发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它一诞生,迅即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它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成为中国各族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高昂的战争,鼓舞了无数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筑成了万众一心、团结御侮的新的长城。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高唱着、呼喊着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冒着日本侵略者的炮火,不惧流血牺牲,英勇冲锋陷阵,为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82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确定《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由于聂耳所谱写的大量歌曲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成为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和战斗号角,因而引起了反动当局对他的仇恨而逮捕聂耳。聂耳按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取道日本赴苏联。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鹤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年仅23岁。

